
任白濤著

應用新聞學

當個新加的卷頭言

——一段商務當局者的來信——

「敝館前收外稿新聞學大綱一書，因有與大作雷同之處；嗣經發覺，即已停止發行；以後亦斷斷不再發行！」（註）

（註）標點符號是我另加的。

白濤特錄。

序

憶吾少小之時，卽嗜報紙成癖。逾冠，與海上二三報社締特別通信之約，而遂置吾身於新聞界，此十年前事也。然吾當時對於新聞事業，興味雖極濃厚，却甚不滿意於中國新聞界，偶有感觸，輒記錄之。若於新聞雜誌中見有涉及新聞紙及新聞記者之事，無論殘簡零篇，更悉珍重收藏。私願於他日爲一書，初未知有所謂『新聞學』也。嗣以祖喪退職。繼復東渡三島，始知二十世紀之學術界，早有所謂『新聞學』者，插足其間，而流布三島者，且亦累月經年矣。課餘，於坊肆遍蒐新聞學一類之典籍，旁稽各種新聞雜誌，終仿杉村氏著『最近新聞紙學』之體例，編製此書，——一九一六年冬屬

稿，一九一八年夏完成。乃就正於愛研斯道之吾友王拱璧，旋經拱璧讎校一過，是正甚多，吾深感之。

一度返國之後，更番東渡，欲刊此書於江戶。未幾，學潮勃發，踉蹌西歸，是爲吾書出版之一大頓挫。——在蹉跎復蹉跎中，頻頻造成與吾書以新生命——易稿——之機會。

昨年夏，南遊至滬，新聞界之舊識新知，咸力促吾書行世。然吾於此書，其始也，唯恐其出之遲，迨夫歷閱數稔，則又唯恐其出之速。蓋吾每經一度之改正，必得一度之後悔。故當發刊之會，決不敢率爾從事，而海上難冗，不適吾居，乃卜遷西子湖畔山幽林邃之處，整理吾書。——自然美與吾以極大之恩惠，而吾書亦得以均霑。換言之，百泉交匯之聖水，忽使吾之性

靈受嚴重之洗禮，而湖山之秀氣，尤不無爲吾書添若干之點染焉。旣而分篇付梓，直至本年初冬，校事始畢。

此區區十萬言之冊子，吾實用去六七寒暑，其間吾固非無別爲，而吾之精神，殆無時無刻而不寄託於此書。至於湖居之年餘，則又純爲此書所銷磨。吾自問後悔成分，已減至零數，可告無憾於讀者矣。然而淺學如吾，時虞不逮，吾今後唯一之希望，是在大雅宏達之教誨耳。

白 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於西湖，六一泉畔。

寫在任著新聞學的上頭

一九一七年，我到東京，見着我的朋友白濤，正在努力地做新聞學者述的工作，積稿已經滿案了。那時屋裏雖只白濤一人；但我的確覺得有兩個朋友在座。「快把同胞們餓死了！你還要『割必正膾必細』嗎？」這是我當時催促白濤趕快脫稿的一句深刻的激勸的話；因為我很知道有許多常讀報紙而不知報紙是什麼東西的人，都在那裏餓着候賑哩。——隔了一年，白濤這書還沒出版，我又笑着同他說：「新聞學的頭生兒真難產啊！」那裏知道這書雖然是白濤的處女著作，而他却是不肯輕率地使它出去見人。他一定要叫我替他看一下子，對於這書出世，懷抱有無窮的願望的我，當然不便推辭，

於是我就很熱心地把這部十來萬字的新聞學——中國新聞學的頭生兒——從頭到尾，都看遍了。

在白濤的新聞學出版之前，曾有一本新聞學出世；但是我看那本書，總覺得不像個科學。後來——白濤的新聞學出版以後——接二連三地又有幾本不正不歪——四不像——的新聞學出現於中國的學術市場；——但無論如何總算有了幾本國產新聞學；而忍饑多年的一般不通外國文和通外國文而沒讀過外國文新聞學的人，也總算得着一點新鮮的食品了。——按正說：新聞學是可以促進報紙的改善的；誰知候了一年又一年；逐漸改善的，真是等於麟鳳；不善的仍是不善。——就量上說，近幾年的報紙，也算增加得不少；但就質上說，我實在不能夠昧心地盲目地去恭維它們！——我為什麼不能夠恭維它們呢？

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報告於讀者；而新聞記事的外表和內容，更須富於公正的，民衆的，教育的，藝術的，和現代生活的色彩；必定有這種記事，滿載於報紙上，這報紙才算善良的報紙。返觀我國大多數的報紙上的新聞記事，還是承襲着十七八世紀的東方御史的『有聞必錄』『言者無罪』的曠典，殊俗：造謠也能，杜撰也能，模糊影響也能，腐化污濁也能，個人陰私也能，帝魔符咒也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幾張潔白的紙，弄得烏烟瘴氣，怎配稱做新聞記事？

報紙所以能夠指導輿論代表民意者，全賴論評；換言之，論評對於報紙，實負着重大的責任。我國現在報紙上的論評，除少數又少數的幾個例外，大概以下列二類爲最多：第一是模稜：這一類的論評，往往出現於色彩

不很濃厚的報紙上，立言不着實際，總想面面俱圖——像六十四面的美人又像闐然媚世的鄉原——在它的字裏行間，從來是認不出是非黑白的。這類論評，可以說是『模稜兩可』的論評，也可以說是『模稜無不可』的論評。第二就是拜金：這一類是宗旨原沒一定，誰拿錢便替誰說話；有時鑽到政客的大腿底下，就能夠不衷事實，瞎拍亂吹，或和此政客的敵人，作無謂的爭論。——甚至於收受帝國主義者的賄賂，就專以阻阻中國的一切人事爲業務；初見好似言人所不敢言，實在這類消極而不負責任的——使讀者灰心短氣的——論評，對於社會一切事業，是只能使它破壞，墮落，不能使它建設，向上的。

廣告的勢力，差不多是與新聞記事並駕齊驅的。有少數的中國報紙，對於新聞記事，還知道負點責任。而對於廣告能負責任的，不但沒有一家，而

且明明是毒物，是危險物，明明是欺騙的，誘惑的，明明是醜惡的，污穢的，明明是違反羣衆心理的，只要拿錢來，就替它登載，替它宣傳；至於那廣告登載後的影響如何，自然是不必管它了。——據說美國的報館，對於廣告，負有極大的責任：假如讀者因欺騙的廣告而受了欺騙，報館對於那個讀者，便要賠償損失：關於這一層，我不知其詳；但我想中國的所謂『大』報者，未必就一點也不知道吧？——我以為因看廣告而受損害的人，是應該向報館要求賠償的！

『新聞政策』自被帝國主義者用作宣傳主義，掩護罪惡，兼破壞攻擊對手國以來，已收得極大的效果；對於民族不振作，輿論不健全的国家，它的效力，尤為顯著；或辦大通信社，以壟斷操縱萬流的言論之源；或辦日報雜

誌，用作『旦旦而伐』，『不含晝夜』的工具；或於對手國內用對手國的文字和對手國的人，來辦通信社和日報雜誌，而爲更進一步的迷惑掩護的手段；或收買對手國現成的通信社和日報雜誌以破壞對手國的記者道德，輿論範疇，而作鬼蜮的借刀殺人的勾當；它的惡辣，陰毒，猛烈，……但就我國二十年來身受的創痕，略一回顧，真要使見者慘目，聞者酸鼻了。假如把這創痕當作一種價值，來估量一下，我敢自信地說：比庚子賠款還值得多！可憐的蒙昧的中國的新聞記者，到現在還聽着這些毒物，在我們的堂奧間，盤踞橫行，甚而還甘心地拋棄天良，替它做宣傳，掩護，破壞，攻擊……的工具。可憐的蒙昧的中國的新聞讀者，到現在還不明白這種毒物是藉宣傳來破壞我，攻擊我……的；甚且把它購置案頭奉爲輿論之母：這種記者和讀者，真

算是不怕狼的蠢羊：要想不給狼做食品，怕是不能倖免的吧！——寫到這裏，我便想起『五卅』乃至其它類似『五卅』的事件了！

真對不起中國新聞界的諸君：我說了許多不大好聽的話；但是我的良心對諸君不能恭維，我又怎敢爲虛偽的恭維？何況咱們都是自己一家人？——雖然，我對於中國的新聞事業，絕望了嗎？不！我不但沒有絕望，並且懷着無限的希望；現在簡單地把我的希望寫到下面。——第一：我希望新聞學研究者，今後更要繼續地努力工作，趕快把新聞學這個科學的旗幟豎起來，鑼鼓打起來，以啓發一般人對於這個科學的興趣。——第二：我希望從事新聞教育者，把新聞學這個科學，至少也和別種科學一樣地看重它。具體言之，必須拿辦理工科的精神和設備經費去辦新聞科，那末，這新聞科才算現代的

新聞科。倘若敷衍，潦草像如今的新聞科或報學科那樣，請兩個似是而非的新聞學「教授」，「編」些似是而非的新聞學「講義」。這種辦法，簡直是誤人子弟的辦法，簡直是吸收學生的父母的血汗換來的子弟學金的辦法！既不配稱為「學」，更說不到「科」上。這樣的新聞科，實在有害無益，倒是不如取消了，聽學生自由地去買兩本專家著述的新聞學，不過破費一兩天功夫，就可以畢事，同時可以省却他們多少日月和多少金錢，來得有意思！——在現代中國，要想辦完善的新聞科，人才一定不夠用，我以為這是不妨借才異地的。——第三：我希望現代中國的新聞記者，要把新聞記者這種職務，當作高尚的，有趣的，專門的，永續的職務去幹；同時，把現代的新聞學，澈底地研究一番。諸君既有相當的專門學識，則諸君的地位，自然可以

得到穩固的保障；老實說一句，諸君的飯碗，是不容易打破的。——最後我希望經營新聞事業的諸君，要澈底地覺悟：現代最進步的報紙，是沒有不注重營業的。只要照最新的經營方法去辦，自然能夠立住強固的經濟的基礎，——關於這一層，英美實例很多，不難一查便知。倘若不注重營業，仍靠『津貼』或賄賂以爲生涯，我敢斷言諸君的事業，是萬不能得着永久的繁榮的，何況還有人格問題？

*

*

*

*

最後再附加兩句：關於帝國主義者的新聞政策的問題——要想置中國國家乃至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問題——我曾於『五四』『六三』運動之間，代表留日的一部分學界歸國，路過上海時，草最毒之日貨一文，發表於各

報；後來又在拙著東遊揮汗錄中，痛論此事！

王拱璧 一九二六年，六月，寫於西湖。

補註：此文原係拱璧爲還書的再版而作的；但他作成的時候，還書的再版，業已印出，遂致延到三版的今日才刊出來。又，原文很長；而且有許多地方，我認爲不宜在書冊上宣布，所以只好暫時割去；這一層我想拱璧是沒有什麼不顧意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

再版的話

受過多少開氣，經過多少離開，方才出現於中國學術界的這本小書——應用新聞學——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夏天，遂着再版的機會了；它是已經得着無數的知好同志了；在這個當兒，我對於它的無數的知好同志——即我的知好同志——確有說幾句話的必要。

在這書脫稿乃至大體完成之後，我都向所謂大書館或大書局者，直接或間接地問過津，可是得到的回敬，却是一樣味道的閉門羹。——我於是做了好幾年的發行者。因為我自問並且自信這書頗值得一出，無論效果如何，決不致貽欺人欺己之謂的緣故。——我終以別種工作的纏身，遂把這書的發行事務，於一九二五年的秋末，完全委諸亞東圖書館了。——亞東方面在從前我並沒有問過，可是他們實在在歡喜這本小書；我也看他們對社會的信用很好，印校一切，更是異常謹慎，絕不苟且，所以把發行權讓給它。

這書交與亞東發行，不多幾時，就得到他們要再版的急報了。我還沒有說了一聲「訂正……」，馬上他們便給我一個「……難以應市……」的堅決的回答。其實我所說的訂正，不過是取消兩個勘誤

表，再稍微更改處而已。這並非是我懶惰；因為我在初版之前，就抱定「再版不訂正」的宗旨，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改換原稿以後，又用西湖的水，好好地把它洗浴了，下，這才准它出去見人哩。另外我的「再版不訂正」的理由，在致吾友某君的信中，可以看出。那信中的一段是：「在古來活版印刷術沒發明的時候，印一部書，很不容易；因此著書的人，也就得着機會，慢慢地去改造他的書；因此古來的名著，大都是學者的終身事業，他們往往只期望他們身後的人讀他們的書，決乎沒有「再版訂正」的隱想。到了印刷術發達的今日，無中無外的學者——尤其是著作專家——都免不了急功好利，濫造粗製的毛病；因此這「再版訂正」，便成著作家們的通有心理和專用熟語了。我想這也是物質文明的缺點，倒不如印刷艱難的古代，出書雖然不易，而一般讀書的人，却不致妄費精神之為愈。我對於這書，就是守着「再版不訂正」的主義，免得迷人惑已。」

固然任何學術——不要說方在發育成長時期的新聞學——都是常常變化改進的。只是這幾年來，我看這門學問，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尤其是同國的同志的新著，不但絕少新義，並且幾乎爭着拿我這本小書做底本，甚至於把我這個不十分妥當的書名，也借用了去！——最不客氣的，要數一位「留美專攻新聞學」的先生的「本其研究所得而作」的大著了；據李氏先生的查攷³，以及我的確切的估計，